

阿古利可拉傳  
日耳曼尼亞誌

塔西佗著

商務印書館

K1261

塔西佗  
阿古利可拉傳  
——  
日耳曼尼亞誌

馬 雍 傅正元譯

DA5/04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32447

商 务 印 书 馆

1959年·北京

732447

Tacitus  
AGRICOLA  
GERMANIA

本書主要系根據布古奧叢書中的 Hutton 英譯本和  
現代叢書中 Church 與 Brodribb 英譯本譯出，又參  
照過原文及其他譯本，詳見譯者前言。

本書原系三聯書店出版，自 1959 年  
9 月起改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塔 西 佗  
阿古利可拉傳  
日耳曼尼亞誌  
馬雍 傅正元譯

---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1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07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京華印書局印刷 宣武裝訂廠裝訂

統一書號：3017·32

---

|                     |                  |
|---------------------|------------------|
| 1959 年 9 月新 1 版     | 開本 850×1168 1/32 |
| 195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字數 77 千字         |
| 印張 3—2/16           | 印數 1—1,000 冊     |
| 定價 (9) 0.42 元       |                  |

## 目 次

|                    |    |
|--------------------|----|
| 譯者前言.....          | 1  |
| 塔西佗及其作品.....       | 3  |
| 阿古利可拉傳.....        | 13 |
| 注釋.....            | 46 |
| 附羅馬經略不列顛大事年表 ..... | 53 |
| 日耳曼尼亞誌.....        | 55 |
| 注釋.....            | 81 |
| 譯名引得.....          | 91 |

## 譯者前言

塔西佗的作品，流傳下來的版本很多，各有不同的地方，英文譯本也有許多種。我們的譯文，主要是根據兩種英譯本譯出的：一種是哈吞(M. Hutton)的譯本，刊於“樓布古典叢書”(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這是一個拉丁文與英文對照的版本；另一種是車遲(A. J. Church)和布洛居札布(W. J. Brodribb)兩人合譯本，刊於“現代叢書”(The Modern Library)中。這兩個版本各有優劣，它們所根據的拉丁原本也不相同。哈吞對於他所根據的拉丁原本作了一番考訂工作，他的譯文，主要是幫助讀者閱讀拉丁文用的，談不上什麼文學風格，但是比較忠實。車遲和布洛居札布二氏所根據的拉丁原本可能不如哈吞所據原本之可靠，但他們的譯文流暢、優美，只是在個別地方作了些不必要的增添和修飾。我們在翻譯本書時，以“樓布古典叢書”中哈吞所據的拉丁原本為藍本；因此，凡是在這兩種英譯本有大出入的地方，我們幾乎完全依從哈吞譯本；而在兩個譯本大致相同的地方，我們則多採取車遲和布洛居札布二氏的譯法。

譯完初稿以後，我們根據哈吞的拉丁原文逐句校閱了一遍。不過，塔西佗的拉丁文素以艱深著稱，而我們對拉丁文的修養有限，所以在校閱工作中，理解錯誤之處，當亦在所難免。為了审慎起見，我們另外又參照了兩種譯本：一種是“人人叢書”中穆菲

(A. Murphy) 的英譯本，這個譯本比較陳舊，與拉丁原文出入處頗多，錯誤較大。但譯文很美，也有參考的價值；另一種是比爾努 (J. L. Burnouf) 的法譯本，這是一個法文拉丁對照本，其所根據的拉丁原本與哈吞所根據的拉丁原本不同，可能同於車遲和布洛居札布二氏所據的拉丁原本。這個法譯本是很著名的一種譯本，對我們也有很大的幫助。

專門名詞除了部分已經通用的譯名以外，大都按拉丁讀音譯出，與大家過去習慣的英文讀音自有不少出入。

凡對本書譯文提過意見和給予過幫助的人，譯者都在這裡向他們致以最衷誠的感謝。此外，譯者希望讀者給它提出寶貴的批評並指出它的紕謬。

譯者 一九五七年秋



## 塔西佗及其作品

古代羅馬共和國是一個建立在奴隸主占有奴隸并剝削奴隸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國家。奴隸的勞動造成了羅馬的繁榮、富庶、強盛和輝煌的文化。但是，隨着奴隸制經濟的發展，奴隸們反抗剝削者的階級鬥爭也一天比一天尖銳，因而不斷地削弱了羅馬統治階級的力量。公元前七四年，爆發了斯巴達卡斯所領導的奴隸大起義，這次起義延續了將近百年之久，震撼了羅馬全國，使羅馬奴隸社會的經濟發生嚴重的危機，從而動搖了奴隸主的共和政體。為了加強對奴隸的統治，羅馬不得不過渡到軍事獨裁的形式，不得不走上帝國的道路。但是，奴隸主們雖然改變了和加強了統治機構，却未能徹底挽救社會經濟中的深刻危機。奴隸運動仍然繼續不斷地發生，奴隸制生產關係逐漸解体，帝國內部力量因為階級鬥爭的複雜化和尖銳化而日益薄弱，對外的聲威也一天不如一天。萊因、多瑙河外的“蠻族”日耳曼人逐漸成為帝國最大的威脅，終至顛覆了它。

羅馬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塔西佗·科納留·普布留（或蓋攸斯）（Tacitus Cornelius Publius（或 Gaius））正生活在羅馬帝國盛極而衰的這段時期中。關於他個人的歷史，我們所知者甚少。除了從他自己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線索而外，只有他的朋友小普林尼（Plinius the Younger）的十一封信札是唯一可供參考的文

献。因此，我們对于他的生平，不甚了然，仅能作出一点简单的报导。

塔西佗的家業和出生地点已經無法确知了。他大約出生在一个高貴的旧貴族家庭里。他的父亲曾在高卢做官，地位頗高。他生于公元五五年以前不久，死于一一七年至一二〇年之間；他的一生经历了皇帝尼罗、加尔巴、維泰利阿斯、魏斯巴兴、狄度斯、多米先、納尔瓦和圖拉真諸朝。

他在少年时代，曾就学于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匡体良(Quintilian)，后来又从阿朴尔(Aper)和塞孔都斯(Secundus)学法律。他成为一个有名的律师。公元七七至七八年之間，他和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兒結了婚。阿古利可拉是当时軍政界的要人。塔西佗可能一方面由于自己在法庭上的声誉，一方面由于結了这門好亲戚，所以便在魏斯巴兴朝开始廁身政界。公元七九年至八一年左右，他曾任稅务使之职，八八年升任大法官。八九至九三年之間，离开羅馬，大約在外省做官。所以当他岳父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都不在死者身边。在这段时期內，他可能游历过羅馬帝国北部边境一带，他对于日耳曼人的知識大約就是在这时得来的。公元九七年，他回到羅馬，任执政官。在一一二至一一六年之間，他曾出任亚細亚行省总督。他的仕宦生涯，大抵如此。其他情形，我們都無从知道了。

虽然我們对于塔西佗一生的事迹知道得不多，但我們对于他的政治見解和历史观点却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一般的認識。塔西佗在政治上显然是傾向于共和派的，他对于帝制具有强烈的反感。一方面，可能由于他出身于旧貴族家庭的緣故，他对于旧的奴隶主貴族共和政体表现出無限的留恋和向往。旧貴族在共和政体下所享受的“自由”，在帝国时期無疑地要受到相当的限制。塔西



佗在他的作品中頌贊着往日的“自由”，而对于帝国时期的专制則深惡痛絕，他对大多数的皇帝，連奧古斯都在內，都沒有好感，他尤其痛恨皇帝手下那些趋炎附勢、讒害旁人的“告密者”。他本人并没有見到共和时期，但在他那个时代，共和派和帝制派的人物之間的斗争还很激烈，塔西佗对共和派深表同情，他經常提到那些被皇帝杀害和放逐的共和派人。虽然塔西佗在这方面可能受他的阶级本能影响，但是，他揭露了许多統治者的殘暴、荒淫、丑恶和愚笨。被当时大多数政客崇奉为神聖的、英雄的皇帝們，在塔西佗的笔下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对于帝国时期統治者的猙獰面目以及政治上的种种黑暗面所作的無情的揭露，使我們对当时的情况具有較深刻的認識。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塔西佗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羅馬国家由盛而衰的一个时代，当时，在羅馬帝国的政治、軍事、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衰落的現象。塔西佗虽然不能理解到这种衰落現象的社会背景，但他却受到这种現象的强烈刺激。在他的作品里，对于羅馬帝国时期国力的衰微、官吏的貪污暴虐、軍事的失利、軍隊紀律的松弛、学术空气的不自由、演說术的低落、統治阶级生活的腐化墮落、被压迫民族的痛苦等等都作了詳尽的报导。我們不敢說塔西佗在他的著作中完全没有报导失实的地方，但是，他的写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他从来不打算掩飾羅馬帝国在各方面的矛盾和黑暗，而是勇敢地去揭露它們。因此，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奴隶制帝国在走向崩潰的初期中的种种症状，而使我們在研究这一个时期的历史时有了寶貴的事实材料。

\*     \*     \*

塔西佗在羅馬的法庭上是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絕的演說家，而他在古今的文壇上更是一員健將。他的作品中充滿了他自己的

感情，即使在描写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物时，也渗入有他的感情在内。他的说服力很强，但这并不是理智上的说服力，而是感情上的说服力。他从来不用说教的方式劝人们相信他的叙述，而是用他自己真挚的、强烈的爱憎来引起读者们的同情和信任。他的描写是生动的、幽默的。他对于人性有深刻的体会，时时能有警策的名言，这是一种高度智慧的产物。我们常说，欧洲近代文艺受古典文艺的影响很大，那么，在塔西佗身上是可以找得到这种传统精神的线索的。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很容易有这样的感觉：他仿佛尽量想表现他是站在他所描写的对象之外的，但他却总是和他所描写的对象溶合在一起。这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地方。

塔西佗也可以说是一位不很幸运的作者。他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高的声誉；在中世纪，他简直被遗忘了。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文学大师薄伽丘(Boccaccio)得到了一部分塔西佗的残稿而予以推崇以后，塔西佗的名字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到了今天，当我们屈指一数罗马最有名的史学家或文学家时，是绝对忘不了塔西佗的。

塔西佗的著作流传至今者共有五部，现在按照他写作时间的先后列举如下：

1. “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
2. “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
3. “日耳曼尼亚志”(De Germania)
4. “罗马史”(Historiae)
5. “罗马帝国编年史”(Annales)

其中之“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将留在后面再谈，现在先把他的其他三部作品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演说家对话录”大约是塔西佗在公元七九至八一年左右写成

的。这是他最早一部作品，也是他唯一模仿西塞罗文体的一部作品——后来他便改变了这种文風，因此，“演說家對話录”和他其他的作品在笔調上是不相似的。这部書談論的是羅馬演說术衰落的原因。他通过書中人物——詩人馬特爾努斯(Curriatius Maternus)、辯护师阿朴尔(Marcus Aper)、史学家塞孔都斯(Julius Secundus)和貴族梅薩拉(Vipstanus Messalla)——的談話来討論演說术的重要性、当时演說术和前代演說术的差异、怎样教育青年人学演說术和修辞学等問題，而最主要的是研討当时演說术远不如前代之盛的原因。按照作者的看法，羅馬帝国时期演說术衰落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改变。因为在共和国时期，生活丰富多采，政治上有激烈的竞逐，所以演說爭辯之風才能盛行。到了帝国时期以后，天下定于一尊，生活安靜、平板，演說之术自然也就無用武之地了。

“羅馬史”約在公元一〇五至一〇九年之間問世。小普林尼曾参加这部作品的写作，他不仅替塔西佗搜集一些資料，而且还对该書个别部分作过修訂。这部書所叙述的时代，包括了加尔巴至多米先諸朝，上起公元六九年，下迄九六年。全書共十二卷，但現在只剩下殘本，即原書最前四卷及第五卷之一部分。所以我們所見到的史料只到魏斯巴兴朝早年为止。

“羅馬帝国編年史”的写作時間較“羅馬史”为晚，但大約在“羅馬史”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即已动手写“羅馬帝国編年史”了。这部書是在公元一一六年左右完成的。它所包括的内容是从提庇留即位到尼罗之死的一段历史。据說他写这部書是有志于繼承李維的巨著的。現在这部書也已經殘缺不全了。我們所有的是第一至第四卷和第五、第六两卷的殘篇(所叙述的均系提庇留朝之事)以及第十一至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卷的殘篇(所叙述的为克劳迭和尼罗

朝之事)。

\* \* \*

“阿古利可拉傳”大約是在公元九八年左右問世的。這是塔西佗替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所寫的一部傳記。阿古利可拉是完成并巩固羅馬在不列顛的統治的人物，他的一生事迹和不列顛的關係至為密切，所以塔西佗這部傳記中有絕大部份篇幅是用來敘述不列顛的情形的。這不僅是一本傳記，也是我們研究古代不列顛的一部文獻，雖然其中的記載並不很完備和完全可靠，但究竟是有價值的。

“阿古利可拉傳”全書共分四十六節，大約可以分成五個部分。最前面三節算是短短的序言，塔西佗在這裡發抒了他對當時羅馬政治和社會風氣的一些憤激之辭。第四至第九節是敘述阿古利可拉的家世、少年生活和他在出任不列顛總督以前的一段仕宦生涯——其中包括他兩度在不列顛軍隊中服役的經歷。第十至第十七節是對不列顛的地理狀況和居民所作的一般描述以及對羅馬人經營不列顛的簡史所作的報導。第十八至第三十八節是用來記載阿古利可拉在任不列顛總督時的政績和軍功的，這一部份占全書的一半左右，也就是全書的重點。第三十九節到最後是敘述阿古利可拉回到羅馬以後怎樣用容忍、謙退的態度來避免多米先的嫉害、他的死亡以及塔西佗對他所作的諄辭。

關於塔西佗寫“阿古利可拉傳”的動機，存在着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塔西佗這部傳記是他在阿古利可拉安葬的時候所作的演說辭。按照古代羅馬的風俗，在舉行葬禮時經常是有人發表演說的。但根據“阿古利可拉傳”寫成的時間看來，距離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時間太久，所以這種說法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種說法認為塔西佗寫這本書是替他的岳父作辯護的。因為在多米先暴君之

朝，許多正直的人都遭到殘害，而阿古利可拉終於默然壽終正寢，當時人可能對他不無微辭，認為他是一個較圓滑、軟弱的人物。所以塔西佗寫這本傳記來祖護他，在傳記中再三強調阿古利可拉和多米先之間的不和協。第三種說法則認為塔西佗寫這部傳記是在寫大部頭的史書以前的“試筆”。第二種說法和第三種說法是可以共存的。至於我個人的看法，我覺得與其去費力追究塔西佗寫作的動機，倒不如多花些時間去玩味他的作品。

“阿古利可拉傳”雖然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作為一種史料來看，這部書並不是很成功的。塔西佗對於地理和軍事常識頗為貧乏。他關於不列顛的地理位置描寫得不很正確，關於氣候和物產的記載有些滑稽可笑，而他所引証的地名大多無從查考。他所記載的戰役也有一些失實。但是，這部傳記很好地反映了羅馬人對於不列顛人的殘暴統治和羅馬官場中的一些黑暗面貌，它能使我們對奴隸制帝國的精神得到較深刻的體會。這種價值是並不在史料價值之下的。

從文學上看，“阿古利可拉傳”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有些外國學者認為這部作品不是一部好的傳記文學，因為作者沒有把全書的精神集中在主角身上。我們覺得這種看法未免有些迂腐和不公允。因為人們是從作品本身的內容來看它的價值，而不是從固定的體裁觀念來衡量一部作品。塔西佗在這部傳記里突出地描寫了阿古利可拉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跡，他對這位主角的性格和作風的刻畫也很生動。作者的目的是在於頌揚阿古利可拉，他的這一個目的也得到了絕大的成功。

第一至第三節、第三十至第三十二節以及第四十六節是寫得最精彩動人的。我們尤其喜歡第三十至第三十二節中不列顛酋長卡爾加可士的誓師辭，這段演說也許是塔西佗杜撰出來的，但它却

真正說出了不列顛人心里的話：它激昂慷慨、痛快淋漓，使人讀到這裡不能不深深感動。

\* \* \*

“日耳曼尼亞誌”大約也是在公元九八年寫成的，這是“阿古利可拉傳”的一個姊妹篇。這篇作品詳細地報導了羅馬時代日耳曼尼亞以及住在日耳曼尼亞的各個部落的情況。它可能是最早一部全面記載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獻，因為朱利烏斯·凱撒的“高盧戰紀”只是零星地談到了一些日耳曼人的情況而已。

“日耳曼尼亞誌”也分為四十六節。我們大約可以把它分為兩部分：自第一節至第二十七節是概括性的描述；自第二十八節至最後是分別記敘各個不同的部落的情況。

“日耳曼尼亞誌”在文學上的價值是比不上“阿古利可拉傳”的，至少我認為是如此。這部作品中的敘述比較平易，沒有許多令人激動的地方，這可能是受到題材的限制。但是，讀起來還是感到很優雅、清新、幽默，有力量。

這一著作的史學價值却是很高的。雖然塔西佗對於日耳曼尼亞的地理狀況、對於日耳曼人的生活狀況也不免有些不甚了然的地方，但大體上是報導得很正確的。我們在研究日耳曼人的歷史、研究德國古代史的時候，決不可能不首先提到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其中關於日耳曼人各個部落的分布、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以及整個日耳曼人的經濟生活、政治組織和社會生活等的材料都是極可珍貴的。外國的史學家們在研究、整理、考訂、注釋這部作品方面花費了許多時間，也得出了不少的成績。儘管後代的學者們發現了若干塔西佗所不會知道的事情和糾正了塔西佗的若干錯誤，但是，塔西佗的原著始終是這些工作的主要藍本。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曾引証了“日耳曼尼亞誌”的材

料；而他在另一篇經典著作“論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中譯文見“史學譯叢”一九五五年第二期）中更詳細地引述了塔西佗的記載：這都是我們在研究“日耳曼尼亞志”的時候應該閱讀的參考資料。

\*             \*             \*

無論是有关不列顛人的“阿古利可拉傳”也好，無論是有关日耳曼人的“日耳曼尼亞誌”也好，塔西佗总是脫離了羅馬人的立場來描寫那些和羅馬人敵對的異族的。因此，這兩部作品不僅都敘述了那些社會發展較落后的部落與奴隸制社會發展到高度的羅馬之間的關係，而且也都表現出塔西佗本人對於落后與先進的文化、新生與腐朽的力量之看法。

有人認為塔西佗反對社會向前發展，這是不正確的。塔西佗在這兩部作品中都很明顯地指出了不列顛人和日耳曼人在物質文明和社會組織上遠遠趕不上羅馬人的地方（雖然他對那些落后的現象帶有嘲笑的口吻，然而指出這些現象總是對的）。塔西佗並沒有同情於那些落后的東西。不過，塔西佗卻同時也指出了那些部落中的生氣勃勃的力量，指出了他們富於鬥爭的精神，指出了他們的自由、純潔、樸實；他這些拿來和羅馬社會的墮落、腐化、淫蕩、不自由、虛偽等等作了鮮明的對比。他諷刺、指責羅馬人的地方遠較他諷刺、指責敵人的地方為多。一方面，他承認羅馬人的發展比不列顛人和日耳曼人進步；另一方面，他揭露出羅馬奴隸制文明的缺點和丑惡：這並沒有矛盾之處。

在這兩部作品里，特別表現了塔西佗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他不是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尖銳地攻訐羅馬統治者對於那些部落所施的殘暴行為，也揭露出羅馬統治者的挑撥離間和籠絡軟化敵人的卑鄙手段。他同情受侵略、受迫害的人民，他指出不

列顛人和日耳曼人不能團結一致是他們遭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他甚至替他們策劃反對羅馬殘暴統治者的方案，替他們發泄被奴役的人民心中的憤怒和悲痛。这正是塔西佗偉大和可愛的地方。

譯 者



## 阿古利可拉傳

(Cnaeus Julius Agricola)

將名人的事迹和品德播傳于后世，這是前代流行的風氣；到了我們這個時代，雖然對於當世人物漠不關心，但是，一旦遇到有些人的德業弘偉，使得愚陋和嫉妒的澆風薄俗不能不為之屈服的時候，這種寫傳的風氣畢竟也還不致完全泯滅，至於那種愚陋和嫉妒的習氣，實在是大小國家的通病。在前代，正因為那些值得紀述的事跡，其行事多出乎自然，而且也比較光明磊落，所以才能使一些大手筆流傳下許多德音的紀錄。那些作家沒有偏袒附和或別有用心動機，他們只求無愧於自己的良心；甚至有些人認為記述自己的生平也算不得是僭妄自大，而是出於自重自敬。茹提里烏<sup>(1)</sup>和斯考茹斯<sup>(2)</sup>都曾寫過自傳，但是並沒有損害他們的信譽，也沒有引起旁人的輕蔑。在最容易產生美德的年代里，美德才最能夠為人們所尊重，信非虛語。然而，在今天，縱使我要寫的這位人物的生平已成過去，我也得要請求世人的寬恕；如果我懷有詆辱攻訐的目的，那反而倒不必請求寬恕了。在我們這個時代中：風氣之濁如此，對美德之存冷誚如此<sup>(3)</sup>。

據說茹斯替古斯·阿茹勒努斯 (Rusticus Arulenus)<sup>(4)</sup> 就因為稱頌特拉薩·拜圖斯 (Thrasea Paetus)<sup>(5)</sup>、赫倫尼烏·塞內契約 (Herennius Senecio)<sup>(6)</sup> 就因為稱頌赫爾維底烏·普累斯古斯 (Hel-